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类型学研究

汪瑞霞，杨兴业*

南京林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南京 210037

摘要：江苏水网密布、物产丰富、人文荟萃，人们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创造了以文化物证为主要特征的聚落景观，以及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在新时代乡村建设语境下，通过系统地观察百年来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轨迹，旨为江苏乡村振兴的全面实施和探寻内生的文化凝聚力提供参考依据。从类型学研究视角，通过类同研究与异质研究，解析20世纪初至今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的生成逻辑。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按照功能可分为四大类型，即生态景观、产业景观、生活景观和生命景观，它们四位一体、融合共生，共同构建起百年江苏乡村建设的文化景观系统，记录着江苏乡建百年的变迁轨迹与集体的文化记忆。

关键词：乡村建设；文化景观；景观图像；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4)02-0042-07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4.02.005

Typological Study on the Image Change of Jiangsu R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ANG Ruixia, YANG Xingye*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Jiangsu has dense water network,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and rich human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construction, people have created the settlement landscape with cultural material evidence as the main feature, as well as the non-material cultural landscape related to local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by systematically observing the trace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mage change of Jiangsu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work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endogenous cultural cohes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Jiangs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ical research,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Jiangsu r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landsca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 the image of Jiangsu r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landscap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including ecological landscape, industrial landscape, life landscape and life landscape, which are integrated into a whole and mutually symbiotic to build a cultural landscape system of Jiangsu rural construction of one hundred years, recording the change trace and collective cultural memory of Jiangsu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Key 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landscape; landscape image; typology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传统乡村“重农抑商”的政策被打破，在这个现代性的建设进程中，中国“城乡背离化”趋势隐然发生。到20世纪之初，“农业立国”还是“工商立国”[1]成为当时中国朝野各界争议的焦点

收稿日期：2023-11-19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1SJZDA106)；江苏高校文化创意协同创新中心第三期建设资助课题(XYN2202)

*通信作者

之一。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诸多深刻的理论命题和研究成果，如晏阳初的《晏阳初全集》[2]、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3]等，提出了关于社会文化复兴、从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乡土重建、通过乡学和村学开发民智、发展乡村经济等重要观点，至今还在闪耀着乡建思想的光辉。还有费孝通[4]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5]《乡土重建》[6]三部著作等，从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视角提出重建中国文化的路径，这些成果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乡村建设既包括对乡村发展基础设施硬件的回应，也包括对集体乡愁等社会问题的回应，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度转型影响着一段时期内乡村建设景观的功能与形态。为了适应环境，在百年来的乡村建设进程中，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与自然和谐共生，产生了一系列宝贵的文化景观。虽然其中有的景观随着时空的变迁而消失，却留下了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资料，记录着百年江苏乡村建设的变迁轨迹与集体的文化记忆。

江苏水网密布的空间格局、品类丰富的物产资源、人文荟萃的历史底蕴，共同造就了其独特的生态人文资源。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是指记录20世纪初至今在江苏的乡村建设过程中，人们创造的，以文化物证为主要特征的聚落景观，以及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图像，包括摄影图片、活动影像、纪录片、文献插图、乡土文学艺术作品等形式载体。这里的“百年”[7]并非精确意义上的历史年代依据，而是宏观意义上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背景下，江苏乡村建设百年历程的泛指。

“类型是从历史之维中抽取出来的隐含系统”[8]，特定的乡村聚落类型凝聚了不同区域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与其心理经验长期积淀而成的聚落形态，立足于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变迁的类型学研究，包括“类同研究与异质研究”[9]。第一步就是找到江苏传统乡村历史变迁中的类同之处，概括出一定规律性的特指；第二步要对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进行异质研究，探求类同现象下有何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正如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所言“中国乡村建设超越了经济的诉求和政局的迷乱，而着力于社会秩序的重构或社会关系体系的建设”[10]。乡村建设涉及不同的学科，文化景观还原并连接着该聚落形式与其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按照功能可分为四大类型，即生态景观、产业景观、生活景观和主体精神景观，它们四位一体、融合共生，共同构建起百年江苏乡村建设的文化景观系统（见图1），解析20世纪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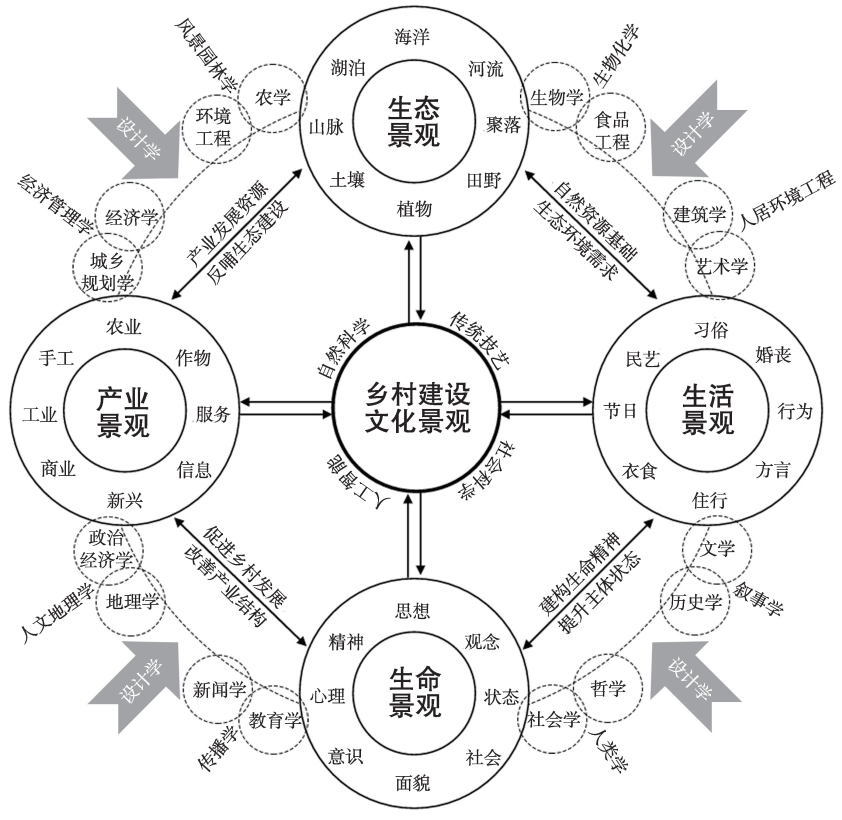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构成类型及学科支撑

至今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的生成逻辑，为当前江苏乡村振兴的全面实施提供学理依据。

一、城乡生态格局的转向

江苏省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物产丰饶，天然的地理与水域环境为江苏乡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资源。据《江苏省鉴》记载“江苏省据海疆之中权，扼长江之门户，形势水陆并重，吴淞江当江海之会，形势首要”[11]，可见江苏省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山脉、水系、地势、大海，是对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产生重要影响的地理环境要素，江苏省共有长江、太湖、淮河、沂沭泗四大水系，长江、大运河在江苏范围内交汇。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就是全国重要的河运段落，“江南”被冠以“鱼米之乡”的美称，一跃成为全国性的经济和交易中心，为古代中国贡献了卓越的粮食和赋税。《世说新语》《楚辞》《吴越春秋》《论衡》等名著都是“在长江以南的地理空间中产生的”[12]，“长江文化”“运河文化”与“水文化”与百年江苏乡建生态景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潜移默化着江苏的地域文化类型，造就了江苏境内苏北、苏中、苏南三大区域各具特色的自然环境风光与乡镇聚落模式。朱彬等[13]对苏北地区的乡村聚落格局特征做了分析，“徐淮平原聚落规模大而稀疏、淮阴平原聚落规模相对大而较密集；盐城地区聚落 规模小而密集”；并将其聚落划分为“盐宿地区聚落高密度分布区、徐连淮丘陵地区聚落中密度分布区、淮阴平原过渡性聚落均匀分布区及徐淮平原聚落稀疏分布区”这四种典型的类型区。单勇兵等[14]通过系统聚类,并结合聚落的格局特征，将苏中地区乡村聚落划分为“里下河湖荡型(低密度团簇型)、沿江沿海滩地型(中密度弧带型和高密度条带型2种亚类型)和苏中平原型3种类型(低密度团块型、中密度宽带型及高密度散点型3种亚类型)”。苏南乡村聚落景观有“平原型、丘陵岗地型、湖荡型、圩区型、山地型”[15]等类型。

然而，近代以来，在外患内忧、战争频繁、土地兼并、苛捐杂税、兵匪之患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冲击下，当时的中国国穷民困，原本“城乡一体”的江苏传统村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江苏虽然水系发达，但是自古以来也饱受洪涝灾害之苦，在近百年来的历史性变迁进程中就遭遇到三次重大洪灾(1931年、1954年、1998年)，“尤以1931年的江淮大水受灾程度最深……毁灭性的水灾使苏北7.7万人丧生，千万亩农田绝收，大批灾民流离失所”[16]。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乡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部乡村的生态景观和农业种植，但是对江苏全域的生态景观建设缺乏统筹，加上城镇化、现代化快速推进，各地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使用，大量河道堵塞，甚至有的河道被填平建房，自然资源逐渐流失，有的区域生态环境遭受到的人为的破坏，乡村聚落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逐渐下降，这些都无疑对江苏生态景观的良性发展与农业生产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造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发生。

为了引导全民自觉保护传统村落，新世纪以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江苏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其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基于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实现的，“识别地区性的生态与人文景观基因，对于把握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变迁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识别地区文化景观的决定性因子”[17]。综合考虑江苏区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发展的相连性、一致性与相似性等因素，按照“五分法”[18]将江苏地域文化分为金陵文化区、淮扬文化区、吴文化区、苏东海洋文化区、楚汉文化区这五大文化片区，不同文化区展现不同的乡村聚落文化景观基因(见图2)，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系统。江苏省各相关市县有序推进历史名城名镇名村的遗存维修整治和基础设施改善，不仅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生态长廊，提高大运河“颜值”，还以“渐进式、微更新、可持续”为理念，实现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单体遗产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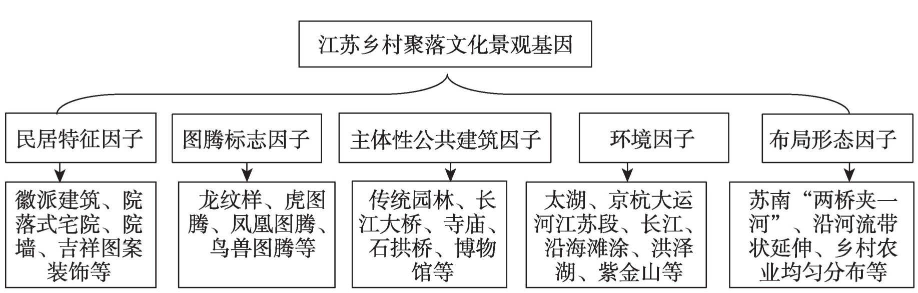

图2 江苏乡村聚落文化景观基因

转向管控保护区的整体保护。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立足“水韵江苏”的品牌定位,江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水岸共生治理模式和控制举措,强化“共生”思维,坚持滨水策活、水岸予民、文景荟萃、包容并进,将散落分布在沿江河湖海和公路铁路的村镇聚落连珠成线,根据聚落平面形态分为点状、线状和块状,从而构建出多样的乡村聚落景观类型,实现跨地区不同城市之间和城、镇、村次级网络系统间的协同合作。以大运河主线及其连通的长江、淮河主要水系为脉络,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沿运划定岸线保护区和控制利用区,建设生态廊道、生态河道,串联起城乡绿地空间生态保护区,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将水岸空间真正还予人民,从城乡二元转向城乡融合共生的生态格局,促进城乡可持续性协调发展。

近年来,传统的村镇景观逐渐修缮恢复,乡村的基础设施、建筑面貌、内部结构及空间格局都发生巨大变化,新型现代化小城镇日渐增多。各地综合考虑城市格局、文物古迹与建筑风貌的保护性复建,同里、木渎、邵伯、河下、惠山等一批运河名镇、一批滨水景观、生态廊道沿河而兴。乡村聚落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人们依托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开展生产、生活,同时也影响和改善了周围的自然环境。这种生态系统是集人文与自然景观的综合体,既包括自然环境因素,也涵盖历史、人文、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

二、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

江苏传统村落是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区域,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乡村产业结构在不断地转型升级,乡村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和地位也重新得到人们的认识与开发。20世纪初,有不少接受过西方现代化农业教育的江南士绅,回国后纷纷著书立说,在江苏乡镇开展教育与试验,力图改造传统农业,走上“近代化农业道路”[19]。时任江苏省立第一农校农科主任的唐荃生“素注意于民食问题”,于1921年主导设立吴江公立稻作试验场,因其“持以毅力”试验场“卒告厥成”[20]。到1934年,江苏各地的农业试验场成绩显著、收入颇丰,形成了农田种植、桑蚕养殖等非常规模化的产业景观风貌。江苏乡村特有的空间地域优势也给新兴产业酝酿了天然的土壤,其本身的生态经济价值逐渐被建设者重视和开发,传统乡村产业已不再局限在单一的农产品生产领域,江苏乡村能在农产品、旅游、生态等多层次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乡村产业结构的单一面貌大为改观。

江苏传统乡村工业即是作坊式的家庭手工业,这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典型写照,同时家庭手工业又与农产品生产互补,足够维持一个家庭生活所需的生产资料。在近代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这种家庭手工业也逐渐具备了工业的一些特征。费孝通曾这样描述过传统乡土产业:“种植五谷为农,加工稻米为工,男耕女织,耕与织就是农与工的区别。”“工业帮着农业养活庞大的农村人口。[21]”这里的工业就是传统农民经营的纺织、制茶和桑蚕等的家庭手工小作坊,是农民维持温饱的重要方向。到民国时期,在江苏有一大批抱有“实业救国”的民族企业家在家乡建厂开办实业,以张謇为代表兴办的大生纱厂是重要代表,一大批实业家的出现促进了江苏乡村产业的兴起,渐渐萌发了一大批以生产工业原材料为主的乡村作坊,并逐渐围绕地区主导产业产生集聚效应。改革开放后,农业现代化和“新四化”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模式逐渐推广应用,“三高”农业不断地向着江苏各地的农林牧副渔,以及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流通各个领域发展,同时伴随着国家试点,也在苏南地区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农业高新技术科技示范园区,如“吴江太湖绿洲现代农业科技园”等重要农业示范区。在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产权制度改革后,“苏南模式”初见苗头,乡镇板块的大规模企业和园区经济成为了带动江苏乡镇经济的动力源,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的“江阴板块”和以“外向型”经济的“昆山板块”发展迅速,不断繁荣,带动着整个江苏地区的乡村产业经济。

得天独厚的水系条件、温暖湿润的气候、充足的雨水供应和广袤开阔的平原,得以让江苏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源丰富多样,各类河流湖泊、生态湿地也为各类物种搭建起繁衍生息的家园,为江苏带来了优越的发展条件,造就了江苏的富庶繁华。江苏的乡村产业结构(见表1),从“单一”的传统乡村农业生产已向第二、第三产业等“多元”多产业经济模式转型。近年来,更是加速数实融合,全力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及县域数字经济建设,探索出“一二三产融合供应链运营、链主企业驱动产业链协同、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集群升级、县域农业产业数字化投资模式等多种路径”[22]。

表1 江苏乡村产业结构的三种类型

产业类型	具体内容
第一产业	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养殖业等
第二产业	食品加工、纺织业、手工业、原材料加工等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业、食品销售、公共服务等

作为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先行者的江苏省，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产业发展激励措施，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沟通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从点状和线性思维转向系统思维，构建“水韵江苏”江河湖海水岸沿线城—镇—村“1>N”多元一体的水系网络共生模式，协同开启了长江、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1>N”强调整体1大于部分N之和，它不仅要从整体上考察“水韵江苏”共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要关心水岸、道路沿线“城—镇—村”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1>N”共生模式中，“1”代表“水韵江苏”共生系统，其含义非常丰富，即“四个一体”：“水韵江苏”是一个水岸共生的生态有机整体；一个协同共建、开放共享的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一个承载着国家形象的文旅品牌；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共建的文化共同体。“N”代表“多元与多点”，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标志性遗产传承点、以特色古村镇为主的生态休闲文化体验点、以主题公园与和美乡村为载体的时代文化创新点。例如“苏锡常通”四市“共享、共治、共惠、共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联动发展。“1>N”多元一体的水系网络共生模式的建构，树立多元共生的系统思维，突出江苏“水韵书香”的文化特质，建立一个跨越时空的江苏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化记忆基因库”；同时注重规划引领，鼓励传统产业焕新、实施绿色转型、强化创新驱动，促进多元产业的协同发展。

三、乡村生活方式的转折

乡村生活景观是指在乡村地区生活的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集体活动、工作休闲等的生活方式，和乡村人民长期与周边自然环境接触后，在改造和创造自然等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生活观念、风土人情、道德观念等的人文景观。乡村生活景观与当地的文化面貌息息相关，并融入人们的乡土社会行为中，带有一种集体性质，体现出传统乡土社会观念的一致性，存在于人们的生产实践过程和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化共同体长久以来形成的经验、行为模式和观念，共同构成了群体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景观。百年江苏乡村建设生活景观变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传统小农经济的解体与农民谋生方式的变化、乡村居住环境的改善与物质生活的丰富、乡村居民行为观念的现代性转变。江苏传统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以农事为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周边环境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较为分散的乡村聚落环境和交通的封闭，导致了本就自足的乡村居民与周边邻居来往并不密切。如无必要的生活物资交换或者要事，并不会经常打扰，这种生活与交往方式单调、规律、缓慢，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这种生活的一种叙写。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形成了江苏乡村居民封闭的心理结构和单一的生活方式，仅有一些全村人相聚的重大节日作为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和休息时刻。江苏传统乡村的农业生产大部分转向了工业和服务业，直接转变了农民的身份。

改革开放后，在联产承包制度推动下，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江苏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从来就有“安居乐业”的说法，体现了传统观念中乡村居民对住房的重视程度。江苏乡村居民的房屋无论是生活空间还是院落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到处破旧的农房如今已变成了小康型住宅楼，居住环境大大提升。农村耕种方式从传统的用耕牛、靠天收，向科学种田和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农业合作社的工人利用现代化烘干生产线烘干辣椒等农产品。乡村医疗条件从落后的乡村医疗转变为科学完备的医疗设施；国家实施基础教育相关政策，将简陋的村小提升为九年制义务教育。就业的多样化、交通条件的便利让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逐渐追求向往的城市生活，有线电视、网络技术普及，我国大力支持5G技术创新，大数据、人工智能给城乡人民带来了舒适与便利。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互联网平台媒介的打通与融合，人们使用银行自助服务办理业务节省了时间、在网上购买商品便宜又方便，也拓展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打破了地缘和血缘的限制，地球村的链接让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在家可以将农产品就销往世界各地，乡村生活的舒适性与便利性吸引了很多城里人返乡，乡村生活成为城里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逐渐变成城乡优势互补。同时，江苏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内容建设，充分运用社交媒体正面宣传传播正能量，乡村社区文化活动丰富，日常生活娱乐形式多样，基层党组织潜移默化的教育，带来了乡村居民观念逐渐从“封闭”向“开放”演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农

民的素养得到全面提升。

1959年开工的南京长江大桥项目是记录江苏生活景观变迁的重要案例。1968年9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这座新中国的“奇迹”巍然屹立在长江之上，一条钢铁巨龙挺直了中国人的脊梁，从此两岸相通，天堑不在。后续由于南京工业区布局的扩大，各种工业厂房、码头、房地产进驻建设，使长江沿岸的生态问题不断产生。新世纪以来，江苏省政府下定决心整治，恢复长江廊道的绿色生态景观，在关停、拆除118家厂房后根据情况进行合理复绿，形成连贯的滨江绿色带，最终岸绿景美、绵延千里的沿江美丽生态带与长江大桥的共生景观基本建成。南京大学教授鲁安东发起的《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23]参加了2018年伦敦设计双年展（见图3），向世界展现了这份独特的作品，记录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历程、共和国的辉煌丰碑、中国人的精神“坐标”，体现出伟大的中国力量。这项伟大成就也被载入史册，成为国家记忆和民族符号（见图4），“南京长江大桥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四、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

“中国传统乡土的小农生产模式有与其相适应的精神文化面貌”[25]，农民成为乡村最大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对社会精神层面较为主观的反映。江苏在传统上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农民占据着很大的人口比重，在百年江苏乡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居民在长期的传统生产实践中受到国家制度、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不断地洗刷着乡村居民的心理与传统观念。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首次采用了“民族”这个概念，之后“民族国家”[26]的概念被广泛印入全国人民的心中。新式教育的推广把这个国家意识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观念，随后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对江苏乡村的景观革新影响深远。

江苏乡村建设实践最有代表性的是早期的陶行知在南京开展的晓庄实验，即为了改善中国乡村教育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院，他为中国教育谋曙光所开展的生活教育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江苏乡村的生命景观。1926年，陶行知刊发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指出晓庄试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开辟新路，它关系到全国农民的幸福”，他认为改造中国首先要改变乡村，“改造乡村社会精神”，要求“以晓庄学院为中心改造乡村教育，以乡村教师为灵魂改造乡村居民”[27]。晓庄师范学院为江苏乡村培养了一大批乡建人才，他倡导的农业生产、建设新式学校、乡村美育等等建设计划，都为晓庄乡村居民的方方面面带来了生

a 万人参观场景　　　　b 通车仪式全景

图3 《激情岁月、大桥记忆》（七）鲁安东教授与大桥记忆计划[23]

图4 《国家记忆；新中国70，年影像志》南京长江大桥生态景观图像变迁[24]

（左图为20世纪70年代拍摄，右图为2016年拍摄）

命图景更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揭开了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新篇章。全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有计划、有步骤的乡村文化建设，逐渐提升了广大农民的精神状态和科学文化水平。结合土地改革，开展的一系列乡村教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江苏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面貌，农民自身的阶级意识也在逐渐被唤醒，逐步削弱了封建迷信和传统宗法观念，乡村农民认识到是自己通过劳动养活自己，改变自己，不再寄希望于命运。改革开放的多元文化改变了乡村道德评价体系，农民身份的转变，改变了自身的文化心理[28]，村民愿意主动去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无疑是一种独立、进取的精神面貌与状态。新时代江苏乡村居民主动地关注中央对于乡村及农业的各项政策，对于自己持有的生产资料和土地财产也有了更多的认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赋予了乡村居民的主体性地位，以村落为单位，自己组建村委会和选举乡村管理人员，还可开办乡村老年学校，学习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和技术。近年来，新农人逐渐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作用，这里的“新”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以职业性为导向的新型农民，成为了现代农业科学发展的支柱力量，成为乡村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人才，逐渐成为包括技能型、生产经营型、社会服务型的专业乡村建设力量。同时，在乡村专业人才的带动下，在实地的乡建实践中，农民的传统观念不断被改造，以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村落带来示范作用，不断地引导乡村居民主动摒弃落后思想，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共同完善和美家园。

江苏的乡村建设全省统筹规划，率先创新机制，一是打通学科之间的跨界协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交叉融合，促进专家学者、乡建团队、社会公众、政府、投资者与社区居民、村镇村民等相关主体间的联动合作，激活了人与人、人与生产、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价值认知和真善美等意识形态，形成生生不息的生产生活系统，从而营造出生态、业态和心态耦合良好的乡村建设景观体系。二是创新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强化以大运河为轴、以江河湖海“水网”为体的社区网格化日常管理，健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点三级协同运行机制；借助科学与艺术融合手段，对乡村的历史、记忆进行挖掘、提取、重组与链接；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实现江苏城乡生态资源串珠成线，跨地区、跨部门推进数字化、精细化管理，通过社区营造、兴办实体、志愿者服务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公共空间治理，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形象建构视域下，打响“水韵江苏”文化品牌，共同构建面向共同富裕的乡村建设文化共同体。

五、结语

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是一个综合的生态系统，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了江苏地域主体文化与地区生态环境的人地互动关系，从民国初期至今的百年江苏乡村建设历程来看，江苏乡村文化景观呈现出百年历程的“图像变迁史”，四大景观类型也随着江苏乡村建设的百年变迁而循序渐进、融合更新，形成一幅动态的乡村景观图像更新面貌。在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的研究过程中，应用类型学研究，能有效完整地认识到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记忆价值、乡村文化建设主体与客体的类同特征；又清晰地呈现其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异质类型和江苏地域文化五大文化区的基因特征，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逻辑，研究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类型，总结百年历程中的乡建学者理念和文化景观变迁中的基因要素，为后续江苏乡村的发展、建设、更新和文化生产等提供宏观的判断框架，使其不脱离地域的主体语境和文化特质，持续推进江苏乡村建设和乡村可持续发展。面对新时代日渐凸显的“三农”问题和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同质化危机，重思百年乡建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景观图像，从中提取关键记忆和文化价值，以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引来建设今日乡村文化景观，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乡村作为中华民族一切文化生产与活态传承的土壤，其文化景观设计对于营造现代人居环境、凸显新时代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景观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蕴含着重要的文化特质与属性，进入图像时代的乡村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吸纳世界各地乡村建设的硕果，同时从百年江苏乡村建设文化景观图像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汲取经验，以共生思维建构起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的新式图景。

参考文献

[1] 王先明. 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26.
[2] 宋恩荣.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1919-1937[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3]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下转第100页）

四、结语

对儿童认知进行充分研究，形成设计重点，旨在为儿童多模态互动式绘本设计提供创新思路。以《玩味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绘本设计，是将科普性书籍与绘本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设计方式，大量的节气文化信息，配以插画辅助说明，同时加入互动元素，在保证整体页面充满艺术性的前提下，满足儿童对书籍信息的阅读需求，同时也旨在实现通过赏析的方式加深阅读印象。当下正是传统互动绘本的转型时期，设计师应不断分析儿童的认知与心理需求，发挥传统阅读的优势，实现纸媒的持续发展，创造出融合多媒介的，易于儿童阅读理解的互动、沉浸式绘本，在信息基本满足的同时，培养儿童多方面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张帆. 基于行为发展的纸质儿童绘本多感官体验设计[J]. 包装工程，2022，43(2)：179-185.

[2] 李战子，陆丹云. 多模态符号学：理论基础，研究途径与发展前景[J]. 外语研究，2012(2)：1-8.

[3] 李碧海. 我国原创儿童绘本的发展现状与策略[J]. 编辑学刊，2021(2)：19-25.

[4] 岳涵. 基于学龄前儿童特征的电子绘本交互设计要素及趋势探究[J]. 编辑之友，2020(8)：85-90.

[5] 张蓓，阳德华，韩露.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对早期阅读活动的启示[J]. 教育与教学研究，2015，29(3)：126-129.

[6] 石慧. 新型数字出版物视觉叙事模式与意义建构——以儿童交互式绘本为例[J]. 出版科学，2022，30(1)：79-87.

[7] 杨茂林. 融媒体和新文创背景下科普IP形象设计创新方法[J]. 包装工程，2022，43(10)：211-220.

[8] 陈永当，付钰. 基于认知发展理论与TRIZ的儿童益智玩具设计[J]. 包装工程，2020，41(20)：131-138.

[9] 胡勇. 概念意义视阈下多模态叙事绘本图文关系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2021，41(6)：104-111.

[10] 张媛妮. 面向儿童认知需求的数字绘本出版优化策略研究[J]. 传播与版权，2023(4)：8-10.

[11] 郭会娟，汪海波，王选，等. 基于发展心理学的幼儿数字游戏界面设计[J]. 包装工程，2018，39(8)：47-51.

[12] 王颖. 幼儿游戏中的认知成份分析[J]. 文教资料，2006(11)：184.

[13] 苟彬. 媒体融合背景下插画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应用[J]. 编辑学刊，2022(1)：97-101.

[14] 薛静. 书籍装帧设计的工艺传达及符号探究[J]. 丝网印刷，2022(18)：28-31.

[15] 柴阳丽，张相学，陈雯冰. AR赋能学习的机理剖析及其阐释——基于AR绘本和纸质绘本阅读的对比实验[J]. 现代教育技术，2022，32(9)：64-72.

[16] 李莉. 5G时代媒介融合视域下的童书沉浸式阅读体验研究[J]. 包装工程，2022，43(8)：358-362.

（上接第48页）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7] 汪瑞霞，何疏悦. 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文化景观的文脉变迁与当代建构[J]. 工业工程设计，2022，4(4)：101-111.

[8] 汪丽君. 历史环境的人文解析与再生研究——基于建筑类型学理论的分析[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6)：527-530.

[9] 付飞亮. 论类型学的定义与范畴[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3)：101-104.

[10] 王先明. 历史转折与时代诉求——对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再思考[J]. 人文杂志，2014(8)：78-91.

[11] 赵如珩著. 江苏省鉴 上[M]. 上海大文印刷所，1935.07.

[12] 程章灿.《世说新语》与中国文化的长江时代[J]. 江苏地方志，2023(1)：4-6.

[13] 朱彬，马晓冬.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与类型划分[J]. 人文地理，2011，26(4)：66-72.

[14] 单勇兵，马晓冬，仇方道. 苏中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及类型划分[J]. 地理科学，2012，32(11)：1340-1347.

[15] 周心琴.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景观变迁研究——以苏南为例[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16] 网易. 1931江淮大洪水：最难忘苏北灾情[EB/OL].（2020-07-21）[2023-09-16]. https://m.163.com/dy/article/FI18V89D05199GUB.html.

[17] 刘沛林.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2011.

[18] 徐四海. 江苏地域文化[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3.

[19] 胡茂胜. 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1.

[21]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2] 新华网. 江苏借力工业互联网赋能数字乡村建设[EB/OL].（2023-06-20）[2023-09-16]. http://js.news.cn/2023-06/20/c_1129707167.htm.

[23] 搜狐.《激情岁月、大桥记忆》(七)鲁安东教授与大桥记忆计划[EB/OL]. (2016-11-01) [2023-09-17]. https://www.sohu.com/a/117847893_503581.

[24]《国家记忆；新中国70，年影像志》编写组编. 国家记忆新中国70年影像志[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9.10.

[25] 陈仲达. 苏南农民思想观念新变化[J]. 苏南乡镇企业，2002(12)：30-31.

[26] 李修科.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中国国家观念的古今之变[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5，29(4)：56-60.

[27] 邓宗琦，熊贤君. 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陶行知在晓庄的生活教育实验[J]. 教育研究与实验，1989(1)：57-61.

[28] 周军.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观念文化变迁的现象解析[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0(3)：53-57.